

中国

现代

五大优秀

杂文家

丛书

梁启超杂文代表作选

少年中国的

呼唤

1936年5月，鲁迅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

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甘肃人民出版社

●李伏虎 编选

I266/230

少年中国的呼唤

——梁启超杂文代表作品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78332

甘肃人民出版社

95.11.18/04

责任编辑：潘 萍

封面设计：高海军

少年中国的呼唤

——梁启超杂文代表作品选

李伏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730030)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6-01909-4/I·506 定价：14.80 元

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

编 选 说 明

《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发表了著名翻译家安危首次翻译的《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和《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原文献用英语写成）。据翻译者研究，1936年四五月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以问题单的形式，就当时中国文学的现状，采访过鲁迅。问题单共提出了23个大问题、15个小问题，涉及了1936年4月前中国现代文坛上作家的倾向、流派，各种文学体裁创作的最优秀作家，左翼文艺运动的成就和现状，政府的文艺政策，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及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鲁迅认真地作了简要回答。因此，这份文献可以视为鲁迅逝世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表的系统评论。鲁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认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杂文作家依次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6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鲁迅这一论断是公正的，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根据鲁迅这一论断，应甘肃人民出版社之约请，我

编选了《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5本),以期比较系统地展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杂文创作的主流,为广大读者奉献一套简明实用的杂文选本。

杂文是以论说为主的一种散文。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之所以在“五四”时期走向成熟,有两重原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另外,现代杂文的产生与发展,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现代“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于是,便采用杂文这种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现代杂文是借助报刊杂志这类现代媒体对旧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而走上文坛的,其源头肇始于梁启超1899年与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梁启超在这两种报纸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使他成为戊戌到辛亥年间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宣传家。由他创作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体,可以看作古代杂文到现代杂文的一种过渡,他的《新民说》、《自由书》、《欧游心影录》,看作杂文集也不为过。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拓荒者,他在1918年4月15日卷4号《新青年》上开设的“随感录”专栏,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只登杂文的专栏,在他的带动

与号召下，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杂文创作。他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等刊物与稍后创刊的《向导》周报、《布尔什维克》等共产党机关刊物上开设的“寸铁”专栏上，发表了670多篇“投枪”与“匕首”式的极短小的杂文，成为“五四”到大革命失败时期大小历史事件的铁的见证。

在杂文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刊物起了特殊的作用，这就是《语丝》。《语丝》1924年11月创刊，1931年终刊，出版了7年。据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该刊向来的编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者并无选取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所删除”。“但在不经意中显示一种特色，即：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除”。鲁迅同时指出：“不愿意在有权者刀下，颂扬他的威仪，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派”的努力使中国现代杂文在2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顶峰，鲁迅和周作人就是“语丝派”中产生的双峰并峙的杂文大家。鲁迅先后在语丝上发表杂文150多篇，他的《野草》的全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中的大量杂文是在《语丝》上发表的。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杂文达432篇之多，他的《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中的相当一批杂文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而林语堂，则是“语丝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翦拂集》中的杂文几乎全部是在《语丝》上发表的。30年代初，周作人创办了杂文刊物《骆驼草》，提倡闭户读书，走入草木虫鱼。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文刊物，提倡“闲适”与“性灵”。只有鲁迅仍一如既往，以杂文作“匕首”和“投枪”，进行韧性的战斗。不

过，从另一角度看，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那种消极的转化，却开拓了中国现代杂文的题材领域，尤其是周作人的专谈衣食住行、草木虫鱼的杂文及科学小品，虽然与狼虎横行的时代格格不入，却大大增强了现代杂文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五大杂文家的杂文数量巨大，异彩纷呈。在编选中，为了更好地显示每位作家作品的主要内容特色，本丛书对每个作家的杂文按内容进行了粗略的分类——虽然这种分法不一定准确。在只有20万字左右的每个选本中，编者在尽量照顾每个作家杂文内容和风格的多样性的同时，稍稍突出了某几个方面的内容。如周作人，突出其有关批判国民性、总结历史教训、对妇女与儿童的研究以及性心理与性教育方面的文章。鲁迅，则突出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国民性、国粹主义，论改革等方面的文章。在编选中，参考了五位作家作品的多种版本，力图保持其作品的本来面目，对于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字词，基本上保持原貌，不予更动。

编选一个满意的文学作品选本，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对作家作品的全面熟知，没有对作家作品特色的整体把握，没有科学合理的编选体例，是做不好的。虽然编者和出版社有关同志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限于水平和时间，遗珠之憾和错讹在所难免，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编选者

1997. 7. 13

梁启超晚年的德谟克拉西观

(代 序)

李伏虎

德谟克拉西,即英文 democracy 的音译,通译民主、民权、人权或民主主义。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兴民权”这一口号的人。早在 1896 年 4 月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论湖南夜办之事》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之三)在 1902 年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发表的大量著作中,涉及介绍西方发主政治、自由、人权的文章更是俯拾皆是。坚持将西方民主政体在中国确立看作唯一道路的梁启超,1918 年底到 1920 年欧洲考察后更加坚信这一点,但却对过去 20 年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使中国走向民主的手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他在 1920 年 3 月 15 日写的《阶级政治与全民政治》一文中沉痛反省道:“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甚么来打来?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

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这样，不但旧的强盗没有铲除，反而使其势力加强，更添了无数新强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少数人替多数人革命或改革的、凭几条好汉包打天下的贤人政治的英雄史观，而这一观点“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如此”。因此，他奉劝改革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官僚的卑劣手段，革命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土匪的卑劣手段，两派都把自己对民主政治的信仰，“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的脑子里头”，才是一条平坦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之二十三）这一观点，梁启超在《外交软？内政软？》、《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等讲演中多次反省过。

为了实现把民主政治的信仰，灌输到多数市民的头脑中以养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全毅然中止政治生涯，从事教育与著述。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建成西方民主政体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巨的工程，必须让多数国民从小养成德谟克拉西精神，这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这一观点在1922年7月3日，在济南中华教育改造社听作的《教育与政治》的演说中，有集中的表述。

在这篇讲演中，梁启超把现代教育界定为“教人学做人——学作现代人”。梁启超认为，现代政治与中国古代圣君贤相包办的封建政治根本不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可不行了，漫说没有圣君贤相，便有，也包办不了政治。政治的千斤担子已经硬压在国民肩膀上来了，任凭你怎的厌恶政治，你总不能找一个没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生活于良政治之下，便生活于恶政治之下。恶政治的结果怎么样呢？哈哈！不客气，硬叫你们生活不成。

怎样才能脱离恶政治的灾难呢？天下没有便宜事，该担担子的人大家都把担子担上，还要学会担担子的方法，还要学会担担子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一个人，除了学会为自己或家族经营单独生活所必要的本领外，还要学会在一个国家内经营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本领，倘若不如此，只算学会做半个人，最高也只得古代的整个人，不算得现代的整个人。教育家既然要教人学做现代的整个人，最少也须划出一部分工夫教他们学会做政治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提出了现代教育必须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政治习惯和判断政治的能力三大任务。而这三大政治品质的共同核心是德谟克拉西的团体生活习惯的养成。这种团体生活习惯有五个条件，现简介如下：

一、团体成员要把团体当成是自己的，要把团体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做，不避嫌，不偷懒。

要习惯这一条件，必须改变中国人历来一家的事只问家长，一国的的事只问皇帝的传统。中国人当了公司的股董，除了公司出了乱子自己经济受损失后气急败坏外，平时并不问公司的事。对个人切身利益尚且如此，对国家的事就不用说了。”人人都会骂军阀骂官僚骂政客，这种恶军阀、恶官僚、恶政客何以不发生于外国而独发生于中国，他们若使在外国便一天也不能在政治上生存，他们能够在中国政治上生存，唯一的保障，就是靠那些老不管事的中国百姓纵容恩典，骂即管骂，不管还是不管，做坏事的还是天天在那里做，倘若这种脾气不改过来，我敢说一切团体事业，永远没有清明成立的一日。”

二、凡团体的事绝对公开，令各个成员都得知道并且有监督的机会。

梁启超认为，“凡一个人立在可以做坏事的地位，十个有九个

定要做坏事，做坏事的人，十个有十个定要秘密，和他说‘请你公开请你公开’那是不中用的，最要紧是令他没有秘密的余地，令人人知道团体生活中的秘密行动便是罪恶，犯这种罪恶便不为社会所容，那么这位秘密魔王，自然会绝迹了。”

三、一件事有赞成与反对的两派时，少数派经过努力后仍然未能得到多数同意，则绝对服从多数，决对不去捣乱和破坏。

四、多数派必须无条件地尊重少数派的地位，令他们有充分发派意见的余地，绝不加以压迫，而且无条件地甘受少数派的监督。

当然，以上两个条件是以自由信仰与自由批评的精神为前提的，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前提的。早在1920年3月18日，梁启超在其《思想解放》一文中指出：“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之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之二十三）欧游回国的梁启超明确宣告，“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改造〉发刊词》，《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二册之三十五）可见，没有信仰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也不可能有多数派与少数派共同遵守

的游戏规则。

梁启超认为，“多数派少数派相互间的道德，这是现代团体生活里头最主要的骨骼，也是现在中国人最难试验及格的一个课题。中国人无论何事，不公开，他便永远不问；一旦公开起来，不是多数派专横，便是少数派捣乱，”这位民国初年的进步党党魁，从自己议会活动的实践中得出这一中国没有民主精神的批评是入木三分的。由于多数派专横，于是少数派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梁启超警告中国人，如不改变这种多数派专横少数派捣乱的状况，中国人只好与现代民主政治绝缘，和政治生活常识绝缘。而在西方民主国家，“他们的少数派安心乐意把政权交给多数派，自己却立于监督地位，多数派也安心乐意接受少数派的监督”。“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彼此互相监督，万不会有人能借国利民福名义鬼鬼祟祟的营私舞弊，他们所有争斗都是用笔和舌做武器，最后的胜利，是专靠社会为后援”。

五、各个团体成员每一件事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凭自己的良心表示赞否，绝对不肯盲从别人，更不受别人胁迫。

梁启超推崇英国牛津与剑桥大学，把养成团体生活所必要的人格放在第一位，把书本知识放在第二位的教育方针。主张在学校中，组织学生自治团体，并且通过体育竞赛、游戏、演讲、辩论，从小养成德谟克拉西精神与习惯。对于中学以下的教育，也应该以从小养成德谟克拉西团体精神和习惯为宗旨进行。为此，他主张很好地编写一本公民教育课本。早在1910年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梁启超在指挥全国立宪派的请愿运动的同时，在该年2、3、4三个月的《国风报》上，连载了《宪政浅说》，年底编写了《国民常识讲义说略》，并为国民常识学会拟订了章程。

为了防止学生把选举不当一回事的尖酸刻尊心理，他清醒地

认识到这是中社会的毒太厉害了，是中国当时统治者轻视民意，搞虚假选举的结果，使学生从小养成这种把严肃的政治生活庸俗化的倾向是罪孽深重的，是到了应该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的的时候了。

梁启超也批评了“五四”时期学校置课时，各学校都不叫反对派有发言之余地，有反对者皆视为叛逆，这也是中国人很坏的一种专制根性，是应该从团体生活中防止的。梁启超指出，“现时提倡学生自动的自治作为将来政治生活乃至一切团体生活的实地练习，这是时代最急迫的要求。”他要求学校至少要分出小半时候做实际生活教育，“最要紧的关键是教职员和学生打成一片做共同的实生活，一面以身作则，一面对不正当的习惯加以矫正，应凡乎把学生教成会做个人——会做个现代人了”。教职员要自身先了解德谟克拉西精神，自己如果有许多反德谟克拉西精神的恶习惯，那就不如不指导的好。

当然，民主习惯养成后还需要正确的政治判断力，一个团体只养成了政治习惯而没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多数通过后如果不正确，若在一个国家则可能导致亡国。在专制时代昏聩的皇帝或家长，因为他个人判断失误造成亡国破家的情况是触目惊心，比比皆是的。然而在德谟克拉西时代，遇着昏聩糊涂的国民，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梁启超认为政治判断力的养成要靠长期遇事考虑与研究习惯的养成和坚持，当然，这不是学校民主精神养成后就伴随而生的，而是要在长期的国民运动中逐渐培养提高。

梁启超指出，以上五条原则，可以看出德谟克拉西，并不是靠一面招牌、几行条文可以办到的，“其根本实在国民性质国民习惯的深奥处所，我们若不从这方面着实下一番打桩工夫，那么，无论什么立宪、共和，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什么中央集权、联省

自治，什么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任凭换上一百面招牌，结果只换得一个零号。因为这种种制度，不过是一个‘德谟克拉西娘胎’所养出来几个儿子，娘不是这个娘，儿子从那里产出？又不唯政治为然，什么地方结合职业，结合慈善，结合公司组织、合作组织……等等，都是跟着一条线下来，德谟克拉西精神不能养成，这种种举动都成了庸人自扰。倘若中国人永远是这么着，那么，从今以后，只好学鲁敏逊在荒岛里过独身生活，或是卖身投靠一位主人倚赖他过奴才生活，再别想要组织或维持一个团体，用团体员资格过那种正当的自由生活，果然如此，我们中国人往后还有日子好过吗？”（以上引文，除已注出外，均见《教育与政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之三十八）早在1910年11月写的《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他就正确认识到新式股份有限公司这类现代企业，只有立宪国才能实行，辛亥革命前中国人办的股份公司，大办大败，小办小败，损失无算，就是由于这种现代企业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

重温梁启超晚年的德谟克拉西观，一方面我们能深深感到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当时这一主张是多么不合时宜。无论是当时在朝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正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人会听他的这些大而不当的哀的美教。这位智慧超人的爱国者，风尘仆仆的奔走在京沪路上到处演说的现代孔子，从1921年10月到1923年初，北京、天津、济南、长沙、武昌、南京、南通、苏州，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做了近40场演讲，有时一天三次，除了一些专谈学术的讲演外，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国民党、共产党的秘密革命活动，这当然只能是伯夷、叔齐式的螳臂挡辕了。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腐败的满清政府、袁世凯内阁、蒋介石政权，他

们都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在辛亥革命后 1913 年的国会选举中，不是多数派专横，少数派捣乱，而恰恰是国民党获得了多数，而其领袖宋教仁却被袁世凯所暗杀，袁又借口参加二次革命解救了国民党，逼迫国民党不得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

在《教育与政治》中，梁启超又一次重弹他 1902 年在《新民说》中坦怨国民素质低下的老调，埋怨中国大多数人不承担现代人应该承担的担子，即不尽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样，他又一次陷入了中国近现代几次发生过的究竟先要一个好政府还是先要一个好国民的讨论的怪圈。中国近现代每当国家危机时都会产生这种朝野的互相报怨，但是，首先需要一个好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如梁启超所鼓吹的大多数国民德谟克拉西精神与习惯的养成，就必需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廉法高效的强有力政府去组织实施且持之以恒才能奏效。

梁启超关于人的现代化——即养成德谟克拉西精神与习惯这一远见卓识，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才有人提出这一人的现代化问题，但远没有梁启超那样深思熟虑。

1997 年 12 月 9 日于兰州

目 录

梁启超晚年的德谟克拉西观（代序）	
人权与女权	（3）
自由书（节录）	（10）
叙 言	（10）
成 败	（11）
慧 观	（13）
烟士披里纯	（14）
无欲与多欲	（17）
说 悔	（19）
世界外之世界	（21）
干涉与放任	（24）
中国之社会主义	（26）
非“唯”	（27）
欧游心影录（节录）	（31）
一 楔 子	（31）
二 科学万能之梦	（33）
三 思想解放	（35）
四 彻 底	（37）

五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39)

说幼稚 (45)

中国积弱溯源论 (节录) (52)

第二节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52)

第三节 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63)

新民说 (节录) (71)

呵旁观者文 (82)

中国道德之大原 (89)

少年中国说 (103)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09)

拟讨专制政体檄 (116)

五年来之教训 (120)

北海谈话记 (节录) (125)

时事杂感 (132)

北京调查户口之报告 (132)

俄国与达赖喇嘛 (133)

我政府之对俄政策 (134)

俄国之第二次哀的美敦书 (135)

英美与英日 (136)

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 (138)

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141)

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 (149)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155)